

·《文献》杂志创刊号回顾与展望·

编者按:《文献》杂志创刊号于1979年12月出版,该创刊号第一篇文章为恩格斯著、李逵六翻译《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至今(2019年11月)仅差一月即将届满四十周年。为回顾刊物走过的历程,向刊物前辈作者与编者致敬,本刊特别策划该专栏。专栏第一篇系对李逵六先生的采访,李老先生回顾了翻译《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背景和过程,梳理了《信条》和《共产党宣言》的关系,为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理解这篇经典文献提供帮助。专栏第二篇揭示2018年国际上新发现的马恩致《资本论》法文版发行人莫里斯·拉沙特尔的一批信札,新文献规模之大,为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发现史上的唯一一例。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鲁路研究员对信札的解读,充分展现马恩在《资本论》法文版翻译出版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李逵六先生访谈录

2019年4月4日上午,《文献》杂志全体同仁在中共中央党校拜访了杂志创刊号首篇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一文的译者李逵六先生。今将访谈内容整理成文,以助记忆,以示纪念。

主编张志清副馆长首先向李老先生介绍了编辑部全体同仁,并呈上刊物第一二辑的合订本。李老先生则拿出其收藏多年的刊物第一辑赠书,说:“屡次搬家,许多书都舍弃了,不过此书还在手边。”对《文献》杂志的记忆,拉近了宾主之间的距离,李老先生很快进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编:您是成仿吾老先生的秘书。

李:是的。1974年底,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教师,接到中央组织部的调令,调我给成仿吾先生当秘书。成老当时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信,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毛主席批示称:“仿吾同志到党校去,专门从事马恩著作的校译工作,找几个人帮。”为什么会选择我,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是由成老的行政秘书请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的同志帮忙挑选一位留过学的人,而我1964-1967年在当时民主德国的莱比锡大学读过研究生。

1975年初到了党校,第一项工作就是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成立了翻译小组。成老安排我负责小组工作,作他的外文秘书、文字秘书。农历正月初五早八点整就开始工作了,可见成老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成老是《共产党宣言》德文本的第一个翻译者;虽然这不是《宣言》的第一个译本,此前已经有从日文本翻译而来的版本(陈望道,1921年)以及从英文本翻译而来的版本(华岗,1932年)。但是德文本毕竟是《宣言》的原版,要忠实呈现马恩思想的原貌,德文本肯定是首选。其实早在1929年,成老还在柏林的时候,曾收到蔡和森同志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要他把《共产党宣言》从德文译成中文,信上署名为Watson。成老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译出来,托了一名德共党员将译稿带到莫斯科。由于蔡和森当时已调回国内,且不久即壮烈牺牲,这一次的译稿也就石沉大海了。1938年,成老在延安与徐冰合作,又一次翻译《宣言》。成老译前半部分,徐冰译后半部分。8月,译本在延安作为《马恩丛书》第四辑出版。同年8月和10月也在上海由“中国出版社”印行,有横排和竖排两种。1945年,成老第三次翻译《宣言》,定稿后交给解放社。不久国民党进攻延安,这个译稿也没有下落了。第四次是1952年,为纪念《宣言》问世105周年,成老一个人将《宣言》中译本稍加校正,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印了少量印本,供校内使用。第五次就是1975年开始的这次了。1976年5月这次译稿由中央党校印出大字本,呈报给中央政治局,供每位政治局委员阅读。我记得很清楚,1976年5月18日,成老重新翻译的《宣言》通过党校机要室送给了朱德委员长。5月21日,朱委员长请秘书打电话来,表示要来看成老,并于下午三时来到党校。这件事对于成老以及我们整个校译小组的工作人员,都是极大的关怀与鼓励。成老的这个译本,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老还在译后记里记下了这次与朱委员长的会见。在与成老会面一个半月后,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

编:您是怎么翻译《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呢?

李:那是在1979年,陈维仁同志(胡耀邦同志的秘书,后来做过党校的副校长)找到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他们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叫《文献》,准备在第一辑上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就是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想找人翻译一下,再请范若愚同志——范老是研究《宣言》的权威专家,在党校教了一辈子的《宣言》——写一篇介绍性的文章。陈维仁同志对我比较了解,就推荐我担任翻译任务——陈副校长直到近几年每次见到我时还都会说:“李逵六,德文好!”我看了文章,是收录在1972年巴黎出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汇编》一书里的德文版,感觉不算太困难,又查找了一些资料作参考,比如1976年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书附录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我们当时翻译有关文件,都使用迪茨出版社的版

本,因为是国家级的出版社,比较权威——译成后就交出去了。

编:所以,您翻译《信条》,算是个命题作文。那么用了多长时间呢?

李:大概用了一个礼拜吧。这不是说我的水平有多高啊,是因为这个并不困难。恩格斯当时写这个东西,是要给工人看的,所以使用了问答体。这就像早期传教,考虑到民众的接受能力,也都使用问答体是一样的。马恩刚开始做工人运动,知识分子写文章也参考了早期传教人士的做法,所以写得很浅显。范若愚同志随后看了我的译文,说:“很通顺,我就不另写什么了,请译者再写一个说明就可以了。”于是我就又写了一篇《译者说明》,介绍了《信条》与《宣言》的关系,一起交了差。整个工作大约是1979年10月间完成的,到12月刊物出版,次年1月14日,编辑部寄来了稿酬通知单,这不,就是夹在书里的这张。写的是:“李逵六同志:承您大力支持,为我刊撰稿。现寄上大作《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一文稿酬32元,敬请签收,并剪下下联寄回我刊编辑部。文献丛刊编辑部,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当时我的工资才56元,这样的稿酬已经算是很不低了。

编:您翻译的《信条》是这篇重要的马恩文献第一次有中文本,那么您对这篇文献与《宣言》的关系,是怎样理解的呢?

李:要我看啊,《文献》杂志创刊号首篇刊发《信条》这篇文章,是个非常聪明的选题。当时刚打倒“四人帮”,知识分子做事都很有积极性,但是出版什么选题一时还拿不准,出马恩的东西肯定没问题,而且还是刚发现不久的马恩重要文献(1968年在西德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马滕斯的档案里被发现),是第一次发布中文版本。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1847年6月2日—9日)之后形成的纲领性文件,而《共产党宣言》则是“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之后形成的纲领性文件。在两个文件之间还有1847年10月底同样由恩格斯草拟的《共产主义原理》(《原理》比《信条》增加了几条,也是问答式的,所以差别不太大);和1847年11月23—24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里提到的概念性的“共产主义宣言”,信中恩格斯主张抛弃问答体的简单的表达形式,撰写一份更加长的文章,更好地阐述共产主义的主张,而且是全面阐述,公开阐述,面向更广大民众,不是仅面对工人阶级了。《信条》可以说是《宣言》的萌芽,而且从内容上看,《宣言》的第三大部分主要来自《信条》,第四部分又非常简单,而第一二部分主要是马克思写的。两者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了。当然后来两人的思想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法兰西阶级斗争》,不过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